

从中心到边缘:《孤独的伦敦人》对“文化中心主义”的消解

李玫玫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塞缪尔·塞尔文的《孤独的伦敦人》是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它是作者试图将边缘文化推向中心文化的努力。本文试图分析小说中被殖民者话语权的植入、模仿人的出现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以显示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消解,小说让边缘民族和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孤独的伦敦人》;边缘;消解;“文化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8-0060-02

一、引言

塞缪尔·塞尔文是著名的特立尼达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伦敦和特立尼达的故事,属于流散文学,他因此也被誉为英国“黑人文学之父”。《孤独的伦敦人》是塞尔文著名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一部。它讲述了二战后西印度移民带着憧憬和美好的愿望来到他们认为“遍地都铺满黄金”的伦敦的故事。小说用克里奥尔英语详细描写了主人公摩西和他的朋友及族人在伦敦的工作生活和感情生活,艰难的生活让昔日的憧憬成为幻影。作为后殖民小说,《孤独的伦敦人》深刻揭露了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统治下被殖民者所处的困境和危机。同时,小说将处于边缘地带的西印度人纳入世界文学的舞台,赋予他们话语和行为的权利,让处于边缘文化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打破帝国话语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统治。

二、“文化中心主义”的统治

现代西方自殖民以来,利用其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针对非西方世界施加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的影响。西方殖民地国家一直标榜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认为非西方文化是未开化和低级的。他们在声称教化非西方国家的虚伪面具下,企图用殖民地文化统治非西方国家,从而确立他们的殖民霸权统治。这样,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便确立了其权威的统治地位。因此,被殖民地的国家长期以来倍受压抑,他们的文化渐渐地从被放逐到边缘地带。长期以来,同样用英语写作的非西方国家或者东方文学由于英语的不纯正也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他们只能扮演一种远离西方中心的“他者”形象,成为帝国中心的点缀物,其存在只是为了确立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的秩序。西方文化的霸权构造了落后和刻板的东方形象,而很多东方民族也接受了这种话语,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也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希望在异国找到某种寄托;另一方面,由于本民族文化根深蒂固,他们又很难与自己定居并生活的民族文化和社会风俗相融合。后殖民理论的发起者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面对咄咄逼人的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与之开展了不懈的斗争,其中有著名的流散作家库切和奈保尔等以及著名的评论家霍米·巴巴和萨义德等。

《孤独的伦敦人》便是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和解构帝国霸权

的小说。作为后殖民文学,小说采用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创造性地形成了开放性、发散性的语言系统,成功地塑造出生活在伦敦的加勒比人的形象。塞尔文以消解中心为目的,在小说中植入被殖民者的话语权、塑造出模仿人的形象,弘扬加勒比海地区民族文化,让处于边缘的多元民族文化来消解以伦敦为代表的殖民者单一的中心文化,挑战和颠覆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

三、《孤独的伦敦人》对“文化中心主义”消解

(一)被殖民者话语权的植入

由于殖民统治和文化霸权,被殖民民族的文化被排斥到边缘地带。他们在西方经典文学中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地位,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的民族的人民存在于其中也只是为了殖民者确保统治秩序而存在。在西方文学中,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白人作家塑造沉默的他者形象以加深他者的在历史中的无形状。作为帝国统治标志的标准英语也自然而然成为权利话语,而处于边缘地区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学则因为不纯正性而被排斥在世界文学之外。很多英语后殖民作家用英语写作,将后殖民文本植入到殖民者的文化体系中,使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因为这种侵入而成为杂交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消解或颠覆殖民者的文化体系。塞尔文在小说中运用民族语言和标准语言嫁接的方式,采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一批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伦敦。

克里奥尔英语是加勒比海地区方言和英语结合的变种的产物,它是对官方标准英语的挑战。通过对英语的戏仿和改造,塞尔文展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通俗语言,以此强化边缘文化的价值,突出弱势群体的存在。在《孤独的伦敦人》中,塞尔文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并使用西印度俚语(rab等)、省略(Brit'n)以及非标准英语语法(it ain't have)等语言技巧,生动地再现了加勒比海黑人的话语风格,“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因而被称为带着克里奥尔面具的黑色叙述”。通过引入边缘文化和语言,作者为处于边缘文化的弱势群体开辟了一个话语空间,使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能听到边缘文化的声音。小说植入被殖民者的话语权,消解了帝国标准英语的权威性,缩短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差距。它是一种反语言中心的语言,它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环境中产生,又反过来颠覆那种语言的中心性和权威性。

(二)模仿人的出现

模拟是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当地人对殖民者的一种模仿,但是这种模仿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内含

着嘲讽和变形,殖民话语因此变得面目不清。模拟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于殖民话语的尊重,但在实践上却戏弄了殖民者的权威。正如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说到:“模拟同样也是不可挪用的符号,是一种差异或桀骜不驯,它与殖民权力的主导型策略的功能一致,强化了监督机制,并且对‘已经被规范化了的’知识和学科权力构成了内在的威胁”^③。由此可见,模拟对殖民话语所产生的效果是深刻和令人不安的。模仿人是深受宗主国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是对当地人的一种同源系统内的模拟。“他与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对殖民权威构成进攻型威胁。殖民话语中模仿人的在场,就是针对殖民权力表征结构的解构”^④。而《孤独的伦敦人》中模仿人哈里斯的出现,就是对宗主国权力话语的挑战和威胁。

哈里斯是众多来伦敦“淘金”的特立尼达移民中的一员。作为生活在大都市中的黑人,他一直都希望别人把他看做是白人或英国人,极力融入伦敦主流社会和文化中。像英国人一样,他特别绅士,很有礼貌,经常对别人说“谢谢”。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他会主动给女士让座,而这却是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会做的事。外出时,他带着黑色圆顶礼帽,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手提箱,口袋里装着泰晤士河报,直挺地走在路上,俨然一副纯正伦敦人的形象。他成为了一个模仿人,接受了主流的社会文化,忽视了自己祖国的文化。他的工作是组织宴会和舞会,因此他经常往来于伦敦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中间。哈里斯处在一个介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者之间的模棱两可、伪装的、模拟的“第三空间”。他试图打开伦敦和黑人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一方面,他希望用占主导地位白人文化来教化他的黑人同胞,他常常告诉同胞们在白人面前要表现的绅士有礼,不要丢黑人的脸;另一方面,他通过举办各种宴会和舞会来展示西印度人民的音乐和文化,以此让白人认识和学习黑人的文化。处于“中间地带”的哈里斯起着连接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纽带性作用,他的出现将黑人植入白人的话语权,使之带有杂质而变的不纯,消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性,对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和颠覆也就得以实现。

(三)民族文化的弘扬

文化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小说中,塞尔文极力弘扬加勒比海地区的民族文化,将属于“他者”的音乐、游戏及民俗文化等介绍到伦敦中心文化中,让世人认识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异域风情。

生活在伦敦的黑人经常聚集在廉价旅舍里,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交流和展示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他们会弹奏即兴讽刺音乐(calypso),这是西印度群岛的一种以多切分音的非洲节奏谱成的音乐,通常由时事即兴表演,还有伴随着这种音乐跳的舞蹈。一些非洲人经常会玩一种游戏,玩这种游戏需要加拉巴葫芦树(calabash,加拉巴木属常青乔木,产于热带美洲,其果实呈大葫芦状)的硬壳和种子,只有非洲人才会懂这种游戏。

丹蒂是小说中最有力地推动加勒比海地区文化的角色,有着强烈的特立尼达家乡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她拥护多元文化,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想将伦敦改造成具有特立尼达特色的大都市。她刚下到达伦敦的火车时,一个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记者采访了她并问她为什么这么多的牙买加人移民到伦敦。家人让她别理他,她却觉得他们要在白人面前表现黑人的礼节并坦率地回答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采访结束后,记者提出要给她单独拍一张照片,而她却要求给她的一家人都拍照,并在准备好

拍照的时候跑回去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带着宽边的草帽戴在头上。丹蒂带有明显的社区团体意识,像她家这样的裙带移民意味着拉丁美洲黑人和亚洲人的边缘文化社区的建立,这给英国带来不同的民族话语。

小说中还将伦敦大都市的拥挤、嘈杂和冷漠和特立尼达的自然风光做了鲜明的对比。伦敦是个充斥着憎恶、贪婪和罪恶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既是朋友亦是敌人。居民区拥挤而又脏乱,每个人都局限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却不知道邻居是谁或者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伦敦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以至于走在马路上如果人们不注意的话就会被汽车撞死。塞尔文借用主人公摩西之口描述了特立尼达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异域风情。摩西常常向往家乡美丽的风景和闲适的生活,他想象着自己躺在阳光下的沙滩上和渔夫闲谈,想象着回家在青草山坡上放牛羊,想象着与鸟儿为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小说的结尾,摩西考虑自己能不能写一本全世界的人都会来买的书。而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他想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让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者”的文化,将“他者”文化从边缘推向中心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列。

四、结语

《孤独的伦敦人》消解和解构了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统治。作者通过在小说中植入被殖民者的话语权、塑造模仿人的形象和弘扬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文化,缩小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距离,挑战和颠覆了西方正统的统治权威,建构了一个后殖民话语空间,让处于边缘的文化慢慢走向中心文化,让处于边缘文化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8.
- [2]任一鸣.后殖民文学:在世界游荡的幽灵[J].外国文学研究,2003(3).
- [3]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M].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4:86.
- [4]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05.
- [5]Selvon, Sam. The Lonely Londoners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6.